

文化中国行

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轼被一贬再贬,直到“天尽头”的海南儋州。

在当时,海南被看作最惨烈的流放地——孤悬海外,化外蛮荒,米比珠贵,“连岁不熟,饮食百物艰难”。

古代官员被贬,并不是罕见之事,但被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,却是少见的。唐代被贬为崖州司马的杨炎,就绝望地说:“一去一万里,千之千不还。崖州何处在,生度鬼门关。”

被贬海南,政敌的意图显而易见,是要置苏轼于死地,东坡先生也作好了死于此地的打算。就这样,年逾六旬的苏轼,在朝廷的催迫下,从一个被贬地惠州,跨过浪高风急的琼州海峡,跌跌撞撞,踏入了这片“九死南荒”之地。

直到三年后,新皇即位大赦,苏轼得以返回北方。翌年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。

近日,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在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巡演,讲述的就是苏东坡南渡北归的海南故事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

易鹰

「安」字是全剧的灵魂

以AI叙事与跨时空视角构建

富有哲思的安顿之问



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剧照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中的女性形象。

观剧前,我就对该剧充满期待,因为苏东坡的海南岁月,是开启海南文脉的一件大事,留给海南丰厚的文化财富;如何讲好这段故事,对于推介海南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但要讲好海南的东坡故事,尤其把它搬上艺术舞台,深觉不易,个人觉得有三难:

一是缺少冲突。戏剧本身要讲究冲突,冲突越尖锐,故事越精彩。而苏轼的流放本身就是边缘化,远离政治中心。此时的苏轼,就是一个荒江野老,所谓“半醒半醉问诸黎,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”——他缺少一个“旗鼓相当的对手”。把这些日常故事搬上舞台,如何建立那种“针尖对麦芒”的戏剧对抗?

二是文心难演。苏东坡作为文学家的核心魅力在于他的诗词、文章及思想。但写诗本身是很个人化的行为,虽然存在外在环境的诱发,但更多的是情感独立的自我抒发。比如,他写下一首旷达的诗,这个“写诗”的行为,在舞台上很难构成一个推动情节的“动作”,它更像是一个静态的、心理抒情的结果。如何让他的精神活动获得外部的戏剧形式?

三是心理设防。苏东坡是一个观众热爱并熟悉的文化符号。他的形象、轶事和名句早已深入人心。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已知的亮点,观众的心理投入会很低。但如果为了制造戏剧性而虚构冲突或过度煽情,又可能破坏观众对这位文化巨人已有的情感联结,引发抵触。

但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这部由一级导演赵京生担任总导演,词作家清风担任总编剧,张渠、钱雷、王艳梅等众多音乐人联袂担任作曲,由夏振凯、蒋倩如、左炜、李想等国内音乐剧实力派演员领衔,廖裕文、赵媛等海南本土优秀演员参演的作品,创造了精彩和惊喜。

如果说看前有不妥,那么看后用一个“安”字来总结感受,或许是最贴切的。这个字既是剧名,也是贯穿全剧的灵魂,更是散场后留给观众最深的心灵回响——遗憾被安放,情绪被安抚,最终归位于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该剧为何能达到“安”这样的艺术效果?盖因戏剧本身要讲究冲突,冲突越尖锐,故事越精彩,苏轼的对手、当朝宰相章惇,远在朝廷,无法构成舞台上的面对面交锋,如何构建张力?

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的解法是,将苏东坡“缺少旗鼓相当的对手”的艺术困境,转化为一场外部迫害与内在心魔的双重围剿。

外部迫害,是由政敌的意志代理人、市井恶吏“董才”在现场执行的。一是剥夺安身之所,将苏轼逐出驿馆,使他由“官身”沦为无处容身的流民;二是阻断精神命脉,为阻挠苏轼著书,董才抢夺他借来的典籍,致其坠崖遇险;三是毁灭毕生心血,董才纵火焚烧苏轼的著作。这三重迫害环环相扣、步步升级,先夺其安,再断其志,终焚其心,将冲突推至顶点。全剧冲突的真正枢纽,也正在这里,正是外部迫害不断剥夺苏轼的“安”,而苏轼的每一次回应,都是在重新定义“安”的含义。于是,一个原本缺少面对面敌人的流放故事,被组织成一场“如何心安”的精神历险,可以说是极为出色地完成了“讲故事”的任务。

讲好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一步,“出人物”才能让这部剧立起来。塑造苏东坡这个舞台形象,需要让熟悉的形象重新变得陌生,让陌生的历史重新变得可感。音乐剧有一个大胆的创新,以AI叙事与跨时空视角构建起一座“陌生化”的桥梁。

这样做的一大好处,就是直接将千年前的东坡,拉回到了现代人的身边。舞台上呈现的不是那个被标签化的“旷达圣人”,而是“复活”一个“有泪有痛、有惧有坚守”的普通人。当观众看到一个会因书稿被焚而失声痛哭、会面对迫害感到无助彷徨的苏轼时,舞台上的苏东坡,不是一个遥远的文化巨人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。

全剧的音乐既有宋词的古典韵味,又不失现代音乐剧的节奏感。苏轼的诗词被谱曲演唱,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——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——在舞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音乐与剧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“配乐诗朗诵”,而是让音乐参与叙事、推动情感,许多段落仅凭旋律和演唱就能让观众落泪。

一部好的剧,应该与时代紧密相连,能够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,具有鲜明的时代感。而真正有时代感的作品,显然不是简单复述历史,而是让历史照亮当下。《心安东坡》呈现出一种“大主题,小切口”的自觉追求,动人之处,是它回应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: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,人如何安顿自己?当外部环境无法选择,命运把人抛向“孤岛”,我们还能不能找到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力量?

这其实是富有哲思的安顿之问。

“心无妄,念无垢,任我千里行走。身无病,梦无疚,任我沧海泛舟。无妄无垢,无病无疚,惟我心安,俯仰无忧。”东坡在儋州所面对的,不只是贬谪、疾病、贫困与敌意,更是如何不怨、不惧、不碎。他把荒岛变成书院,把苦难变成著述,把流放变成归来……

反噬让剧情反转,以整人为乐的章惇最终自食其果,被贬雷州染病,东坡不计前嫌施以药方。这不是政敌的握手言欢,而是君子对小人的以德报怨,更显东坡心安中的心善与心宽。这对今天的观众而言,不是遥远的古人轶事,而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生存哲学。剧目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感:它问的是东坡,答的是今人。

当然,我们也许可以由《心安东坡》出发,开拓出更为宽广的创作天地。一个60多岁的老人,被贬到天涯海角三年,却没有沉沦,反而在绝境中活出了另一番天地——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东坡回望自己的海南岁月,以此作评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东坡一生数次被贬,虽越贬越远,心却越来越安。东坡海南三书《易传》《书传》《论语说》,让他“即觉此生不虚过”。北归途中过海遇风浪,他将随身携带的书稿视若生命,抚稿叹曰:“所撰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皆以自随,世未有别本。”又叹曰:“天未丧斯文,吾辈必济!”这样的故事,不只属于苏轼,也属于每一个在困境中寻找“心安”的你我。

(作者系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、局长)



音乐剧《心安东坡》中的苏东坡。